

另一个中央：一九三〇年的扩大会议

陈进金

内容提要 1930 年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西山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简称“扩大会议”),欲另立党统。该会不仅通过宣言,而且组织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争正统”,制订《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以“争千秋”。以往囿于国民党党统观念,北平扩大会议未被国民党史所正式承认。本文即欲跳脱国民党正统观的束缚,正视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政治现实,根据台北“国史馆”典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阎锡山档案》等原始资料,透过“争党统”、“争正统”、“争千秋”三个阶段来阐释扩大会议。

关键词 扩大会议 中原大战 阎锡山 汪精卫

一、前言

扩大会议,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系指 1930 年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西山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所召开的欲另立党统的会议。该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2 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 年版,第 597—598 页。

会议不仅通过宣言、起草约法,并且组织了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以往囿于国民党党统观念,北平扩大会议未被国民党史所正式承认,其所成立的国民政府也被视为“伪”政府,阎、汪等人甚至被指为“叛乱集团”。

过去有关扩大会议的论著,大多属于回忆性文章,或偏重于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出版之《中国国民党职名录》,虽搜列有不被党统正式承认的上海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职名录,扩大会议则付之阙如;第三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之“概述”中亦未提及,足见扩大会议不为国民党史所正式承认。见李云汉主编、刘维开编辑《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台北,党史会1994年版,第72—84页。

李云汉主编,林养志、宋正仪编辑:《中国国民党一百周年大事年表》第1册,台北,党史会1994年版,第278—279页。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4编,台北,党史会1994年版,第87页。

有关回忆扩大会议的文章甚多,举其荦荦大者如下:邹鲁《回顾录》第2册,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版,第368—373页;陈公博《北平扩大会议》,载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6)》(以下简称《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年版,第226—257页;薛笃弼《扩大会议始末》,载赵政民主编《中原大战内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8—460页;冀贡泉《阎锡山与扩大会议》,载《中原大战内幕》,第445—453页;邓哲熙与戈定远《冯玉祥与扩大会议》,载《中原大战内幕》,第454—457页;田象奎《国民党扩大会议始末》,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58辑,1988年版,第22—28页。这些当事人回忆性质的文章仍有错漏之处,不可遽信。例如邹鲁有关扩大会议的回忆云:“及汪北来,表示接纳。那时阎部已和平接收平津各机关。民国19年6月13日,我们就在北平成立扩大会议,产生政府。同时反对中央的战事也就正式爆发。党的方面,我们主张以党权还诸全党,所以预备召集四全大会。”(《回顾录》第2册,第317页)上述这段回忆,有几点明显错误:扩大会议成立的日期是7月13日,不是6月13日。扩大会议成立时,汪精卫仍在香港,追成立后才北上,于7月23日抵达北平。双方战事正式爆发应于5月中旬,不是在扩大会议成立同时。扩大会议主张召集的是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不是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强调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比较缺乏客观而深入的讨论。学界以扩大会议为专题研究者，首推沈云龙《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一文；沈氏运用报章杂志、当事人回忆录和部分函电等资料，全面探讨扩大会议之酝酿、争论、成立及影响的历程。沈文虽为研究扩大会议的经典之作，但仍有其局限和不足之处，如受限于当时的政治情势，文中黄少谷、谷正纲皆以“黄××”、“谷××”替代。此外，扩大会议召开前，改组派和西山派的争论情形，东北军等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以及为何扩大会议召集一个多月后才正式组织政府等等，均有待深入的分析。

再者，沈著《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一文距今已逾20年，近年来相关人物的回忆录和各种史料文献的整理出版，尤其是原始档案的解密开放，已使扩大会议的资料更为完备。笔者不以名家之论而敬谨从之，拟根据新材料，特别是台北“国史馆”馆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阎锡山档案》等，对扩大会议这一课题予以新的阐释。

二、争党统

党统，系指中国国民党一系相承的法统。阎锡山、汪精卫等召集扩大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中央争夺国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9页；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92页；韩信夫：《阎锡山与北平扩大会议》，载相从智主编《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原文发表于《传记文学》第33卷第4期（1978年10月），此处参考沈云龙《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283页。

沈云龙：《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第270、271、272、274、276页。

民党的正统地位。不过,在会议召开之前,改组派和西山派却也为“党统”问题彼此争论不休,几乎使扩大会议濒临流产。以下即欲探讨改组派和西山派由互争党统到妥协结合,进而联合召开扩大会议的经过,即由互争党统到与蒋争党统的历程。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时,孙中山基于革命策略的需要,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对外联合苏俄,冀望其援助中国国民革命;对内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事业。姑且不论“容共”政策的本意是“溶共”或是“统一战线”,此后国民党内即因容共问题而争论不已。

迨孙中山逝世后,尤其鲍罗廷操持汪精卫国民政府后,国民党内的纠纷和冲突更为激烈。1925年8月,胡汉民因“廖案”被迫出国赴俄;林森、邹鲁亦受排挤离开广州,其他如谢持、戴季陶、张继、邵元冲等“反共”人士也相继离粤。汪精卫和中共左倾势力几乎已完全控制广州中国国民党党部。

为了抑制共产党,林森、邹鲁决心联络旅居各地的中国国民党第一届执监委员,召集一届四中全会,共谋对策。1925年11月,林森、邹鲁、谢持等人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会议,即俗称之“西山会议”。该会通过取消共产派在国民党之党籍案、鲍罗廷解职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案等

蒋永敬:《从护法到北伐》,(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期,1984年3月,第152页。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87年影印版,第218页。

郭恒钰认为从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立场来看,1923年至1927年的国共关系是“国共统一战线”。见郭恒钰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序”代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7页。

《回顾录》第2册,第207页;居正编:《清党实录》,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50—67页。

项决议。足见其对汪精卫、鲍罗廷等控制国民党中央的不满,特别是议决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形成粤、沪两个中央党部对峙之局。此为中国国民党的首次公开分裂。

鉴于西山派在上海另立党统,汪精卫等人除策动舆论指摘其为“叛逆”外,也急谋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因应。1926年1月,广东中央召开二全大会,出席代表除共产党人外,大都为国民党左派分子,大会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西山派的处理,并通过“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与此同时,上海中央也积极筹开二全大会以为对抗。至此,中国国民党内因容共驱共之争,已彻底决裂成粤、沪两个中央党务系统,其距孙中山逝世,仅及一年。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不久即攻克武汉、江西,翌年3月占领上海、南京,长江流域几为国民党势力所控制。国民党在军事上虽获得胜利,但在党务与政治方面却因容共反共意见分歧而导致“宁汉分裂”。即当时中国国民党有三个中央党部(沪、汉、宁),有两个国民政府(宁、汉),而其分裂的症结皆归之于中共问题。及至武汉分共后,宁、沪、汉三方才决议合作成立特别委员会

居正编:《清党实录》,第7—17页。

易正义:《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年6月,第8页。

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不详),第31页。

究竟有多少共产党员以大会代表名义参加粤中央二全大会,各家记述不一;不过,共产党员几乎控制大会议程则是肯定的。见《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685—687页;韦慕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版,第40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293页。

上海中央二全大会仍赓续北京西山会议“反共”、“分共”立场。见《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册,第677—682页。

统一党务,组织政府。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暂时整合了自西山会议以来国民党内部分裂的状态,但因党内实力派人士(如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皆不表支持,特别委员会仍告无疾而终。

1928年底,东北易帜,中国达成形式上的统一;然欲迈向实质的统一政局,端视党权、军权能否归于一统。是以北伐完成前夕,蒋介石在中央党部讲《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时特别指出:我们中国内部,尤其是本党党员个个要能够明了主义,共同一致来拥护中央,服从中央的命令;个个武装同志能牺牲个人的地位权力,奉还中央,完全由中央来统一财政、军政。其具体办法即为:实施国军编遣和举行国民党三中全会。不过,在三中全会前夕,汪精卫等改组派人士已视南京中央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更不满其指派三中全会代表,谴责其违反党内民主精神,遂埋下会后党内纷争的根源。1929年3月15日,原本被寄望可统合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如期于南京召开,虽建立了党的新权力中枢,但因改组派、西山派几皆被摈斥于外,使党的整合遥遥无期,而另一场争党统的风暴已酝酿其中。

1928年夏,北伐军事告终,蒋介石决心裁减军队。翌年元旦,国民政府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准备从事部队缩编,此举引起旧军阀的猜疑,遂有一连串反抗中央的行动。在历次军事行动中,阎

党史会编:《革命文献·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史料》第16辑,台北,党史会1968年影印版,总第2872—2874页。

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载《革命文献·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史料》第21辑,总第4128页。

汪精卫等:《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载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157页。

《三十年动乱中国》,第148—152页;刘维开:《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43—160页;简又文:《冯玉祥传》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5—337页。

锡山表面上与南京国府保持良好关系,暗中则唆使冯玉祥、唐生智倒蒋,甚至代拟唐与西北将领的通电稿。后因唐生智结纳汪精卫等改组派人士,引起阎的疑忌,才有1929年12月20日阎锡山、张学良等人联名“拥护中央统一”的通电。至1930年初,时局似趋于安定,但阎蒋关系已渐行渐远,终至兵戎相见。

1930年2月10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主张礼让为国,力言武力统一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约蒋氏“共息仔肩”,以弭党争。12日,蒋复电云: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至2月底,南京中央和阎往复文电十余封,围绕党国问题相互论辩。正值蒋阎进行“电报战”之际,蛰居香港的汪精卫一方面致电支持阎锡山,一方面派陈公博、王法勤北上活动。而西山派的邹鲁则早已在北方运动反蒋。故一向势如水火的改组派、西山派,在反蒋的大前提下,有了共同合作的机会。

《唐生智致蒋方震电》(1929年12月18日),《阎锡山档案·杂派民国18年3月至12月往来电文》,台北“国史馆”藏,档号18.0372.42/0032—3—12(以下简称《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29)》,并不再注档号、藏所)。该电文末称洛、郑防务已请宋、孙接防,亦为阎所深恨之一端。

《袁华选致唐生智电》(1929年12月7日)、《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29年12月10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29)》。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29年12月20—26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1期,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辑,文海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总第2313—2314页(本文以下所引《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均为影印本页)。

《阎锡山致蒋中正电》(1930年2月10日)、《蒋中正致阎锡山电》(1930年2月12日)及此后往来电文,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以下简称《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7册;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2卷第2辑,台北,1952年版(出版者不详),第46—65页。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549页;《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2月21—27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8期,总第2454—2455页。

《苦笑录》,第226页。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541—542页;《回顾录》第2册,第368—369页。

1930年3月18日,汪精卫电请阎锡山速组织政府,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以资号召。阎氏对于组织政府一事,曾表示俟陈公博、王法勤到后,即可筹划一切。不过,筹组政府之前,必先解决改组派、西山派的党统争议。3月下旬,陈公博、王法勤(改组派)、邹鲁、谢持(西山派)、赵丕廉、贾景德(晋阎代表)等人,在北平什刹海召开会议,讨论组织中央扩大委员会,解决党政问题。由于改组派只承认粤二届,否认沪二届,邹鲁等坚持粤、沪二届平等,当时在香港的汪精卫也反对粤、沪二届并存,两派因党统问题而起纷争,遂使该次会谈毫无具体成果。会后谢持曾致电许崇智,表示:“改组派又欲否认沪二届,讨论数日,持等坚持沪二届平等谈,致无结果。阎有组军政府计划,大势如此,沪主张断难实现,应专效力军事为善。”邹鲁也写了一封长电给正在潼关督师的冯玉祥,文中云:

军事进展之时,党事未能商妥,至歉;而未能商妥之故,由于改组派必欲存彼方之二届,而否认沪方之二届……且就粤二届证之,委员为卅余人,反蒋者未及半数,其中改组派则不过数人,非特不能代表粤二届,乃欲否认沪二届,必为整个团结之障碍。证之数年来,反共反蒋均系沪二届,岂反共反蒋出自汪等则为功,出自弟等则为罪乎?进而言之,党统实已破

《胡宗铎致孔庚电》(1930年3月18日戌时),《阎锡山档案 杂派民国19年1月至12月往来电文》,台北“国史馆”藏,档号19.0372.42/0032—1—12(以下简称《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误记为3月24日。

《陈公博王法勤致张允荣电》(1930年3月24日),《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565页。

《谢持致曹叔季电》(1930年4月3日),《王法勤陈公博致陶冶公卢蔚乾电》(1930年4月5日),《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

《谢持致曹叔季电》(1930年4月3日),《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

碎,而改组派则破碎之破碎,实不配再言党统。

谢持、邹鲁均对北平会议中改组派否认沪二届的态度表示不满,谢持且似有放弃再协商之意。

西山派、改组派北平会商破裂后,陈公博、王法勤即于4月1日首途太原,与阎锡山晤谈。据陈、王致胡宗铎电中表示:阎对邹鲁所提沪二届亦不苟同,但坚持政府由党产生,且政府组织应网罗各方,为表示团结已派人赴平接邹、谢来并。遂有4月中旬的太原党务会议。

邹鲁对于解决党统纷争,曾经提出三种办法:用一届行使职权;用沪、粤两个二届行使职权;用革命方式另起炉灶。然基于党统已破碎,邹氏认为宜采用革命方式,舍弃法统观念,以有历史及功绩的同志组织干部行使职权。赴太原前夕,邹也与阎的代表贾景德、温寿泉举行秘密会谈,获得初步共识为:将党事另行讨论,先组织最高政治会议,并由该会产生政府。但此一会议结果,仍须征求阎、冯及奉张同意后才能正式对外发表。邹、谢等人就带着这一方案赴太原谒阎,但并没有获得阎的认可,阎锡山仍坚持政府需由党产生。

1930年4月中旬,改组派、西山派在太原的党务会议又因党统问题而陷入僵局。因为党事一直无法妥善解决,坊间传出陈

《邹鲁致冯玉祥电》(1930年4月9日),《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

《王法勤陈公博致胡宗铎电》(1930年4月5日),《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

《邹鲁致冯玉祥电》(1930年4月9日),《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

《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4月9日),《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

邹鲁、谢持等人于4月11日离开北平,12日晚抵达太原;14日与陈公博、王法勤及晋方代表赵丕廉、荣鸿胪、辜仁发、袁鸿昌、郭懋治等举行谈话会;16日举行太原会议。见《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4月11—17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15期,总第2558页;《白云梯陈公博致胡宗铎转汪兆铭电》(1930年4月18日),《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

公博极力联冯制阎,并唆使平津工人大罢工以胁制阎氏。此则消息虽未经证实,却足以反映党统问题之纠结难解,似乎只有期待汪精卫北上。但汪氏亦不认同邹鲁等坚持声明粤、沪二届合并之议,曾致电陈公博、王法勤云:

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乃吾人最低限度之主张,决不再退一步。环龙二届较之蒋之伪三代会更为滑稽……弟意宜详告阎公,二中与西山已无可调停,阎公若重视西山,即请阎公与西山共同组织中央党部及负政治完全责任。

对于汪精卫这封近乎决裂的电文,阎锡山派商震、冀贡泉手持亲笔函往晤陈公博等人,谓党务仍归汪氏负完全责任。至于党事,依然盼望容纳左右两派。

另一方面,陈公博认为因邹鲁坚持沪二届党部,致使北平、太原会议均无进展,乃与傅汝霖等相偕转赴平、津与覃振等商洽进一步办法。陈公博等以覃振为西山派中较易沟通且不反对改组派者,与之磋商数日,终使北方党务问题露出了一线曙光。覃、陈商议的原则为:以党国为前提,消释一切个人或派别之意见;完全采取非常手段,撇开数年来党的一切纠纷。在这两项原则下决定:对于党务,则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国事,则召开国民会议

《刘珍年致赵辅宸电》(1930年4月11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阎、冯及驻晋各代表都曾电请汪精卫赴太原,陈公博白云梯也致电汪氏北上领导一切,并表示汪若北上有三大意义:表示诚意助阎倒蒋;或可解决党事;可扩大宣传。见《白云梯陈公博致胡宗铎转汪兆铭电》(1930年4月18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胡宗铎叶琪致陈公博王法勤电》(1930年4月21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王法勤白云梯陈公博致胡宗铎电》(1930年4月25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并制定约法。谈判数月的党事,有了解决之势,谢持、王法勤、白云梯、邹鲁等人,也相继由太原赴北平加入会商,终于决定:粤、沪二届各自发表结束宣言,再发表一封联名总宣言。

西山派、改组派好不容易获得的共识,因为汪精卫的一封电文又起波折。1930年6月1日,汪精卫发表通电,重提二届党统问题,强调粤二届为正统。此举引起邹鲁、谢持的不满,二人于5日发电驳斥之;12日,汪氏又发表《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之必要》一文,虽然表示愿与西山派消释前嫌,一致努力,但依旧坚持粤二届正统论;北方党统之争再起。这期间曾传出汪蒋合作、阎另组劳动国民党等消息,且汪精卫与邹鲁又打起了笔战,改组派、西山派似乎已告决裂;但实际上,覃振曾致电汪精卫劝其牺牲成见,晋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5月2—8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18期,总第2597—2598页。

1930年5月4日至7日,覃振、张知本、茅祖权、傅汝霖、陈公博、胡宗铎、郭泰祺、叶琪和陶冶公等九人在天津会谈得初步决议,即函电阎、冯及在太原党内要人。11日,王法勤、白云梯、谢持由太原抵北平,会议移往北平续商;19日,邹鲁、赵丕廉又自太原来北平加入会商。见《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5月2—8、9—15、16—22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18、19、20期,总第2597—2598、2617、2629页。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5月30日—6月5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22期,总第2650页。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5月30日—6月5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22期,总第2652页。

汪精卫:《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之必要》,载南华日报社编《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民国19年)》,香港,1930年版,第207—215页。

《张笃伦致刘文辉电》(1930年6月18日)、《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6月24日),《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

汪精卫和邹鲁等为了“以党治军”、“以人治军”在报上打起了笔战。见汪精卫《以人治军?》,载《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民国19年)》,第232—243页。

阎代表赵丕廉、冀贡泉亦从中努力斡旋,终使两派同意合作。其办法为:两派发表一通联名宣言;粤二届发表提议召集扩大会议宣言,再由沪二届发表赞同宣言;署名则皆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至此,西山派、改组派的党统之争乃告落幕,北平扩大会议遂于7月13日召开。容纳左右两派的北平扩大会议,自认承继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否认以指派代表产生的南京国民党三全会议,准备召集另一个中国国民党三全会议。至此,中国国民党正式分裂成北平、南京两个中央党部,彼此互争党统。

三、争 正 统

正统,原为封建社会中某一王朝统一全国后对其一脉相承系统的自称。本文所谓“正统”,系指行使国家政治权力的法统,亦可称为“政统”。

阎锡山发动军事倒蒋之初,即明白政治上需要另立一个中央,来否认南京政权;同时,将来善后在法统上也才有所凭恃。1930年2月,阎氏于“电报战”中即强调“党人治党,国人治国”;其致蒋电云:“惟党国者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必须

《覃振致汪兆铭电》(1930年6月4日),载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3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影印版,第283页;《覃振致傅汝霖电》(1930年6月26日)、《危道丰致王树翰电》(1930年7月1日),《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冀贡泉:《阎锡山与扩大会议》,载《中原大战内幕》,第447—450页。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7月11—17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28期,总第2715页。

李茂盛等著:《阎锡山全传》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60页。

一起交还于党。”2月23日,阎等45人联名通电中亦云:“夫以党治国,必有整个的党,始能成整个的国。党若破碎,国必不能不破碎。今欲求统一之国,必先求整个之党。”故阎氏一直坚持扩大会议必须容纳左右两派,且政府一定要由党产生。

扩大会议联名宣言中否认南京的三中全会,主张要“以整个的党,还之同志;统一的国,还之国民。”该会议的成员包括粤、沪二届委员和以军事首领身份加入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即阎所谓之“整个的党”。阎氏既然已达成“整个的党”,就要以此为基础,去完成“统一的国”,即组织国民政府来与南京国民政府“争正统”。

扩大会议成立后,汪精卫即离港北上,于7月23日抵达北平,随即与谢持、邹鲁等交换党政意见,确定党的理论及今后党务办法,双方获得了共识,并于28日第一次谈话会通过“求党的真实意义实现”的7项基础条件:(1)筹备召集国民会议,以各种职业团体为构成分子。(2)按照《建国大纲》制定一种基本大法(其名称用约法抑用宪法再定),确定政府机关之组织及人民公私权利之保

《阎锡山致蒋中正电》(1930年2月20日),《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7册,第60页。

《阎锡山等45人通电》(1930年2月23日),《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3册,第66—68页。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7月11—17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28期,总第2716—2717页。

陈公博回忆扩大会议包括一、二、三届委员,阎锡山、冯玉祥均以三届委员身份加入。见《苦笑录》,第231—232页。上段回忆可能有误,因为扩大会议系反对南京三中全会,若容纳三届委员,将难以自圆其说,又如何去“争党统”。阎、冯、李(宗仁)等,均以军事首领身份加入,原本亦包括张学良,但张未参加。见《危道丰致熙洽电》(1930年7月3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7月18—24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29期,总第2725—2728页。

障。此基本大法,应由国民会议公决,如时期紧急或由扩大会议宣布,将来俟国民会议追认。(3)民众运动、民众组织应按照《建国大纲》,由地方自治做起,严防共产党激起阶级混斗之祸端。(4)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监督之地位,不直接干涉政务。(5)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6)总理遗教,所谓以党治国乃以党义治国,应集中人材,收群策群力之效。(7)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按照《建国大纲》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学者曾评述上列七项基本原则:系国民党人基于数年党治的经验所得,不失为救偏补弊的良策。不过,无论是阎锡山或汪精卫,都认为组织国民政府才是首要之务。

阎、汪等筹组国民政府,除与南京中央争正统并建立领导重心外,还具有下列几项目的:

(一) 结纳地方实力派

1928年底的中国,大致形成南京、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沈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7月25—31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0期,总第2741页;冯玉祥:《冯玉祥日记》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三十年动乱中国》,第164—165页。

“地方实力派”一词,谢本书认为是有特定涵义的概念,指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控制着一定地盘,掌握着可观军队,具有相当的实力,进行着反抗日本侵略势力的斗争,而又不属于蒋介石中央嫡系的地方军事(或军政)领袖们及其派别。见谢本书、牛鸿宾《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林能士、杨维真则认为抗战前已有“地方实力派”,并非专指抗战时期。见林能士、杨维真《抗战前国民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关系——以川滇黔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5期,1998年5月,第199—235页。笔者亦认为中原大战期间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和西南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省等地方军事(或军政)领袖们一样,也控制着一定地盘,掌握着可观军队,具有相当实力,名义上虽属中央,却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故可径称为“地方实力派”。

阳等6个军权中心。1930年中原大战初期,除张学良东北边防军控制的沈阳中心外,其余5个军权中心几已全部卷入战局;西南的川、康、滇、黔四省,名义上虽隶属南京中央,实际上并未积极参战,处于中立的地位。是以,东北和西南就成为影响战局的关键,也是双方极力拉拢的对象。

阎锡山于1929年“护党救国军”诸役中,被指为“工于心计,老谋深算”,1930年2、3月倒蒋时,部分地方实力派仍对其怀有戒心。是以,阎氏组织国府,实具有反南京中央的宣示作用,并且藉以结合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四川、东北。1930年的四川省,有多股政治势力,阎、汪透过组织政府予以容纳,并曾约集各川军代表协商出兵。至于东北态度,最受阎、汪重视,阎氏在扩大会议成立前就曾多次提及组织政府一事,以征得东北同意为第一要义。扩大会议成立后汪氏与张学良代表汤尔和会谈时,也表示若奉张不要党治,国民党亦可以旁观,不会成为大局的障碍。足见结纳地方实力派是阎、汪组织国民政府的重要目的之一。

蒋永敬:《国民党实施训政的背景及挫折》,载蒋永敬著《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75页。

阎锡山曾因韩复榘、石友三和平通电而犹豫不决。见《赵辅宸致刘珍年电》(1930年3月11日),《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35—137、139页。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四川省有多股军政势力,如刘文辉、刘湘、刘存厚、杨森、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除刘湘坚决拥蒋外,其余者于战争初期首鼠两端,而后才以刘文辉为首,积极助阎,刘文辉还任北平国府委员。汪精卫曾派王东臣、陈欣庸约集四川军代表协商出兵。见《冷融胡畏三王荫椿甘泽霖吴莲炬张笃伦胡锐谢致刘文辉并转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电》(1930年9月14日),《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

《危道丰致王树翰电》(1930年7月1日)、《汤尔和致王树翰电》(1930年8月7日),《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

(二) 解决财政困难

战争期间,除了战略、战术外,充裕的经费亦是胜利的要件之一。中原大战前夕,北平、天津的英文时报刊载一幅饶富趣味的漫画:蒋一手握机关枪,一手捧银元;冯一手执大刀,一手捧窝窝头;阎一手执手榴弹,一手托算盘。此画似乎暗喻南京中央有充足的财政支持,事实上蒋的财政并不如漫画所示般的不虞匮乏;不过,若与阎锡山相比较,则仍可用“充裕”二字形容。晋阎虽有山西及平津税收挹注,但军用浩繁,又得支助西北军及杂派饷项,故远远不敷战争所需。此外,晋钞贬值、战时赋税通用券与设立国家银行等问题,均有待其一一克服。而阎氏认为,组织国民政府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有其正面助益,故于电文中也一再宣称:为解决财政问题应速组政府。

(三) 争取国际支持

任何国家发生战争时,其外交的努力约可分为两个方向:实质物资的争取和国际地位的争取。中原大战虽不属于两个国家的战争,但蒋、阎双方仍极重视国际外交。尤其晋阎,若能让各国视其为交战团体,使各国维持中立不助蒋,其外交努力已可算是成功。基于此,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就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后,就由其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01页。

根据《蒋档》,蒋几乎每月均为了经费不足电请宋子文增拨,甚至委请宋美龄向宋子文催付款项。见《周骏彦朱孔阳致蒋中正电》(1930年7月25日申时),台北“国史馆”藏:《蒋档 特交文卷》第8册,总编号540。相关档案极多,可参阅陈进金《蒋中正总统档案的史料价值及其运用——以民国19年中原大战为例》,载《中华民国史专题集第四届讨论会秘书处编《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四届讨论会》下册,台北,“国史馆”1998年版,第1299—1301页。

有关中原大战之财政因素,笔者拟另以专文《中原大战的关键因素:财政问题》探讨。晋钞贬值、战时赋税通用券、设立国家银行等相关档案甚多,不再一一列举。

《马骥材致岳相如电》(1930年7月3日),《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

外交处长朱鹤翔面交各国公使《对外通告》。6月间,晋军围攻济南时,阎氏亦应各国领事所请,下令保护其侨民。8月扩大会议诸要人与日本使馆代办矢野及新闻记者酬酢不断,矢野并云:日本外交不得不重视北方。在在显示阎锡山争取国际支持的努力。再者,如天津海关关税、矿产抵押借款等问题,若能妥善处理,对其战情当有所裨益。

由朱鹤翔给阎锡山的一封电文中,更能看出阎氏透过组织国府以争取国际支持的努力。该电报云:“顷据法馆沙参赞密告,王正廷迭发三电致法使促赴宁,经复以本月内决难起程,至早须下月视蒋能否回宁,再定行止。沙并称北方政府成立如能不事浮夸,从实际方面依据法律切实进行,必能博取各国同情等语。而原本只注重南京政府的日本,在北平国民政府成立后,亦由其武官铃木年一邀请北平政府派代表赴日。足见阎、汪等成立政府有助于争取国际支持。”

汪精卫北上主持扩大会议党务时,北方对于组织政府已有共识,汪氏乃一方面筹备召集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会议,另一方面则积极筹组政府。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于8月7日在北平怀仁堂召开,由汪精卫任主席,决议通过《扩大会议组织大纲》、《中央政府会

《中华民国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38),第21页。

《周沆致毛光翔电》(1930年6月26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8月9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参阅阎沁恒《转变中的中英关系》,台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129页。

阎锡山曾以富贺银矿向日人借款,以井陉煤矿向美人借款。见《麦焕章致李宗仁电》(1930年8月10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朱鹤翔致阎锡山电》(1930年9月2日),《阎锡山档案·各方民国十九年往来电文》,台北“国史馆”藏,档号:19.0372.42/2700—1—22(以下简称《阎档·各方往来电文》)。

《岳开先致阎锡山电》(1930年9月6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

议规则》，并推定常务委员会委员7人（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组织部委员5人（汪精卫、邹鲁、陈公博、赵丕廉、朱霁青）；宣传部委员5人（顾孟余、潘云超、傅汝霖、薛笃弼、张知本）；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5人（覃振、白云梯、陈嘉佑、陈树人、商震）。

此外，扩大会议在党务方面，如党员重新登记、恢复各省市党部、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工作，均已积极展开。

至于组织国民政府一事，阎、汪均视东北态度而定。前已述及，扩大会议成立前，阎锡山曾多次表示组织政府必须获得奉张同意。7月13日，扩大会议成立时，张学良驻平代表危道丰以私人身份前往观礼，受到大会热烈欢迎。7月下旬，汪精卫抵平，亦即透过贾景德、薛笃弼介绍，邀约危道丰商谈党政事务，极尽拉拢之意。

另外，贾景德、薛笃弼、郭泰祺等人，亦曾于7月21、24、26等日多次要求前往拜会张学良；正在连山葫芦岛“休养身体”的张氏，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8月1—7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1期，总第2761页。原本于7月31日谈话会预拟组织及人选，设有海外部委员3人：邓泽如、陈树人、陈璧君。惟正式会议中却未设，原因待考。见《赵丕廉致阎锡山赵戴文电》（1930年7月31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

沈云龙：《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第275页。

沈云龙认为阎、汪俟党务处理完善后，才准备建立政府。惟就当时川军驻北平代表冷融等观察，“政府当即日产生”。见《冷融王荫椿谢致刘文辉并转邓锡侯田颂尧电》（1930年8月11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又据贾景德、赵丕廉告知危道丰云：阎、汪在石家庄晤谈时，已有产生政府办法，但均须获得张学良同意才决定。见《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8月7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故阎、汪是否俟党务处理完善后才组织政府，值得怀疑；不过，组织政府的关键在于东北态度，则无庸置疑。

《危道丰致王树翰电》（1930年7月13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7月24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则以岛中十分不便,难以招待贵宾,及亟须休养为由,婉拒贾景德等人的会晤之请。

为了争取奉张的支持,汪精卫写了一封长电给张学良,电文中除了谴责蒋介石“藉党之名,行一人独裁之实”外,更详述扩大会议求党真实意义之实现的七项基础条件。张氏乃派汤尔和赴北平会晤贾景德、汪精卫等,此一举措招来日人大肆宣传晋阎奉张已合作,将不利于中央,也引起南京国府的疑忌,间接导致8月14日的“马廷福事件”。

马廷福为东北军于学忠部驻临榆旅长,阴图协同团长孟百孚、安福魁袭击平、津以附蒋,事为于学忠所发觉,遂于榆关、北戴河二处将二人分别予以逮捕。据调查,马廷福等之异动系受陶敦礼贿赂所致,而陶敦礼与南京代表方本仁是同乡,又曾任职于何成浚部。故平、津及上海地区均流传“马廷福事件”完全由蒋方所主使,并且认为此一事件将导致蒋方与奉张正式决裂,东北必定加入讨蒋行列。蒋介石也曾感叹云:“奉张反叛之心渐见矣!北方军阀政客,其不欲使国家统一,而割据自私之心,传统相承,不能破除。”

《危道丰致王树翰电》(1930年7月21日申时)、《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7月24日)、《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7月25日)、《危道丰致王树翰电》(1930年7月26日),见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5—209页。

《危道丰转汪兆铭致张学良电》(1930年7月29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第210页。

《汤尔和致王树翰电》(1930年8月4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秦华致王树翰电》(1930年8月4日),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第175页。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8月15—21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3期,总第2776—2777页。

《张笃伦致刘文辉电》(1930年8月18日)、《王岫生致李家钰电》(1930年8月21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此我中华之所不能立国于今世,而为帝国主义所陵(凌)侮不已也。呜呼!”

原本一直坚持中立的奉张因“马廷福事件”态度似乎有所转变,而相继与北方代表贾景德、薛笃弼、郭泰祺、傅作义、覃振、陈公博等人会晤商讨时局。据覃振等向记者谈话指出:张学良认为北方主张公正光明,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对南京则因“马廷福事件”而增加恶感。阎锡山为了争取东北倒蒋,曾表示可将平、津地区让予奉张,由张学良委派孙传芳为平津卫戍司令,并归张氏节制;汪精卫亦云只要奉张倒蒋,不谈党治亦可。可见在“马廷福事件”后,张学良与北方似已达成某种共识,北方要人也认定奉张必定加入倒蒋行列,乃积极筹组政府。

8月29日,覃振、傅汝霖、陈嘉佑、郭泰祺、贾景德、薛笃弼、赵丕廉等7人偕赴太原谒阎,商讨组织政府问题;同时,汪精卫等亦于北平起草《国民政府组织大纲》。9月1日,扩大会议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政府组织大纲,并推定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等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阎为主席。至此,北平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中国遂形成南北分裂的“一国两府”局面。

《蒋文件·文物图书·困勉记》,1930年8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8月22—28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4期,总第2783—2784页。

孙诒敬编:《民国十九年之蒋介石先生》,《蒋文件·文物图书·事略稿本》,1930年8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冷融致刘文辉电》(1930年8月24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8月29日—9月4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5期,总第2793页。

四、争千秋

千秋,即千载、千年也,指年代久远之意。1928年底,东北易帜,全国在形式上暂告统一;但因编遣会议加深了军人的猜忌,国民党三中全会促成党人的互相仇视,导致北伐后形式一统的局面维持未及一年,内战再起。郭廷以曾对上述情形评论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为军阀的天下。北伐完成后,旧的既未尽去,新的继之而来,意识如故,行为如故,不及一年,内战再起,历史有如重演,此伏彼起,为数之频,规模之大,更是后来居上。居中央者说是求统一,在地方者说是反独裁。”事实上,无论是中央的“求统一”,或是地方的“反独裁”,其目的大都在争取统治权(中央或地方)的延续;而其政权存在与否,几乎皆依靠军事上的胜负。随着党权的衰落、军权的扩张,北伐后的中国形成军权独盛的局面。

1929年反南京中央的历次战役中,汪精卫之改组派由“旁观者”、“协助者”而变为“当事者”。冯玉祥、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等,皆奉汪之中国国民党二届委员会为正统,以“护党救国军”名义起兵,故论者称这一时期为“护党救国军之变乱”。护党救国军诸战役,均以汪精卫之国民党二届委员会为正统,否认南京中央的党统,不过仍被视为地方政权对抗中央政权。再者,国民党左派之武汉政权经验,仍为大多数民众所忌惮,其号召力诚属有限。

基于上述反南京政权的历史经验,阎锡山于起兵倒蒋时,即欲另立容纳左右两派的党中央去“争党统”,另组以整个党为基础的

《近代中国史纲》,第591页。

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东京,庆应通信1980年版,第253页。

《三十年动乱中国》,第148页。

政府去“争正统”。此外,阎、汪等更致力于政治建设,扩大会议通过之“党政七项基础条件”,即为阎、汪等人政治建设的蓝图。故汪精卫在扩大会议第七次纪念周上报告云:“我们组织政府,不独为讨蒋,即本党主义政策,方能重新整理,使本党真精神真面目给民众看。”1930年9月1日,北平扩大会议成立国民政府,随即加速起草约法和筹开国民会议等方案,就是执行上述政治建设蓝图的开始,目的在谋求国家长治久安。

9月2日,扩大会议拟定约法起草委员会人选,中央推选汪精卫、张知本、茅祖权、冀贡泉、陈公博、邹鲁、顾孟余等7人,另聘法学专家6人(罗文干、吕复、高一涵、梁式堂、郭泰祺、周鲠生)等计13人为委员。13日,约法起草委员会发表通电,征求全国意见,并拟于一个月内起草完毕,以为训政时期之根本大法。15日,约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汪精卫被推为主席,郭泰祺兼任秘书长。汪氏于报告《起草约法之意义》时特别指出:训政时期的约法与民元时期的“临时约法”不同。他说:“我们现在所要的约法,并不是辛亥及民元那样的约法,所要的是训政时期约法。即确定政府对人民的关系,政府对于人民的权利,其干涉程度有一定之限制。这是革命时代所必要不可或缺的……我们认定训政时期的约法,一方面要训练人民,一方面要给以(予)一定之权力。”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8月29日—9月4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5期,总第2796页。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8月29日—9月4日、9月12—18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5、37期,总第2796—2797、2826页。

因所聘之法学专家与会者过少,约法起草委员会曾委请郭泰祺以私人身份征询胡适是否愿意加入该会。见《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9月12—18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7期,总第2826—2827页。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9月12—18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7期,总第2827页。

基于上述目标,约法起草委员会随即密集召开四次会议,决定“关于人民自由权利”之起草原则为:(1)人民之自由权利,于约法上酌量规定富有弹性立法原则,而以其详委之法律;(2)干涉人民之自由权利,行政官厅得临时执行之,但其最后决定属于法院;(3)关于人民自由权利章,推吕复、张知本、冀贡泉三委员起草;(4)约法内容,除筹备方案所定四大纲外,加增经济、教育两大纲。

“关于中央地方机关组织”之起草原则为:(1)为自治团体,同时为国家行政区域;(2)关于事权之规定,中央取列举主义,地方取概括主义;(3)举行各县自治时,应设县议会;(4)各县自治成立时,得选举省民代表一员,组织省议会;省议会之成立,于该省有过半数之自治县选出省民代表时成立。正当约法起草渐上轨道之际,因张学良于9月18日发表通电,呼吁和平,静候中央措置,遂使该项工作暂时中挫。

中原大战期间,奉张一直为南北双方所共同争取的目标。阎锡山、汪精卫筹组政府前,即屡屡征询张学良意见,积极结纳东北。北平国民政府成立时,昇以张氏国府七委员之一,并拟于新政府部会首长中,委以较多奉系人士,故当时各方往来电文,几乎都认张学良一定支持阎、汪。其他如东北军中的元老派也大多主张与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9月12—18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7期,总第2827—2828页。

认为张学良必定支持北方政府的电文极多,如《邓鸿业致邓珊电》(1930年8月31日)、《张文英致王振东电》(1930年9月1日)、《齐慎致任应岐电》(1930年9月1日)、《北平冬日特讯》(1930年9月2日)。此外有谓北平国府各部内定人选为:外交部长顾维钧、司法部长罗文干、农矿部长汤尔和、海军部长沈鸿烈(以上奉系);交通部长贾景德、财政部长梁汝舟、工商部长赵丕廉(以上晋派);陆军部长鹿钟麟、内政部长薛笃弼(以上冯派);国营实业部长胡宗铎(桂系);教育部长邹鲁(西山派);侨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树人、蒙藏委员会主任委员白云梯(以上改组派),见《王岫生致李家钰电》(1930年9月6日)。各电均见《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

北方合作,万福麟曾提出四点理由表示:“与其接近中央,莫如接近西北。”张作相更与晋阎关系密切。在在显示东北军与北方政府较接近。

至于张学良本身,自3月1日发表通电以来,他虽表示中立,实则较倾向于南京方面。不过,8月14日“马廷福事件”发生后,张氏态度已有所改变,不但与北方代表多次会商,似乎也默许顾维钧等加入北平政府。因为“马廷福事件”,让阎、汪等误判蒋张必定决裂,遂安心筹组政府。不料,北平国民政府成立第二天(9月2日),张学良即当面向傅作义表示,他并未赞成新政府之成立,言语中对汪精卫之改组派尤多不满。傅作义只好急电阎锡山,速派贾景德、薛笃弼再返沈阳谋求补救,并请阎氏答应给东北一定条件。

1930年9月初的沈阳,成为中国政局的重心,南北双方代表十余人齐集奉天,进行游说活动。北方代表有贾景德、薛笃弼、傅作义、门致中、孔繁蔚、杨廷溥、陈继淹等,他们请张学良接受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任命,毅然加入北平国民政府。南方代表吴铁城、方本仁、张群、李石曾等,则敦劝张氏速就任南京国府任命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并且出兵平津。

东北军为商讨如何应付时局,乃召开最高干部会议。9月17

《万福麟致王树翰王树常电》(1930年8月1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第5、6册合集,第35页。

《崔廷献致阎锡山亲笔函》(1930年9月7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

《张学良通电》(1930年3月1日),《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7册,第79页。
陈进金:《蒋中正总统档案的史料价值及其运用——以民国19年中原大战为例》,第1297页。

《傅作义致阎锡山电》(1930年9月2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

《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38),第552—553页。

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至麟等奉系军政要员 50 余人,齐集边防长官公署大楼会商终日。翌日,张学良即发表和平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南京)措置”。

张学良的和平通电给北平扩大会议暨国民政府带来莫大冲击,也令阎、汪等人错愕。汪精卫于 19 日即致电张学良,条陈祛除内战、息兵弭争的四项意见:开国民会议;开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约法;剿共防匪。

与此同时,汪精卫与阎、冯电商,决定要一致奋斗到底,如时局恶化即前往太原、西安。9 月 19 日下午 7 时许,汪等诸位扩大会议委员商议决定:除部分委员赴天津外,扩大会议移往太原。24 日,阎、汪等决议,推刘守中、赵丕廉、商震等在太原领导扩大会议职员及各级党部积极工作。阎、汪等一方面在太原恢复扩大会议,另一方面仍对张学良东北军有所期待。当时仍有人认为奉军主和并非拥蒋,甚至以东北军入关系有利于北方之举,阎、汪等人则寄望于入关后的东北军与蒋军产生磨擦。汪精卫等人的期

《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38),第 552—553 页。

《和平通电》(1930 年 9 月 18 日),载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 1 册,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16—317 页。

《汪兆铭致张学良电》(1930 年 9 月 19 日),载《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 年 9 月 19—25 日),《国闻周报》第 7 卷第 38 期,总第 2840 页。

《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38),第 562 页。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 年 9 月 19—25 日),《国闻周报》第 7 卷第 38 期,总第 2841—2842 页。

《贞致贺庸达电》(1930 年 9 月 30 日),《阎档 各方往来电文》。

《张笃伦致石嵩生电》(1930 年 9 月 22 日),《阎档 各方往来电文》。

《宋英仲致汪兆铭电》(1930 年 9 月 28 日),《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1930)。

望是可以合理解释的:入关的东北军系和平接收,并未诉诸武力;张学良未就任南京政府所委任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因此,阎、汪等对奉张主忍让,对宁蒋主坚持。此外,汪精卫邀集四川驻太原代表,要求尽速解决刘湘,便于出兵。

由上述可知,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后,阎、冯、汪、李等仍继续一致奋斗,务求倒蒋。在军事上,寄望于东北、四川;在党务上,将扩大会议移至太原办公。随着时局变化,蒋军相继克服开封、郑州,10月10日洛阳守军葛云龙自愿服从南京中央,听候点验移防。孙连仲、鹿鍾麟等亦相继归顺南京,阎、冯联军已不可为,汪精卫等扩大会议委员仍积极致力于制定约法草案。汪精卫曾对报界发表谈话云:“余在北平及石(家)庄、郑州、太原屡次郑重说明,无论军事变化若何,吾人党务政治之主张,必得绝对胜利。即个人独裁必须打破,民主政治必须实现,国民会议必须召开,约法必须

由于学忠致王靖国的一封信文可资证明,该电文云:“王军长安兄勋鉴:久闻声威,中(忠)心倾向,敝军此次接防河北,旨在倡导和平,对于各方均持友善态度,谅邀明言。顷奉东北张司令长官电令,着派一旅开赴保定接防等因,刻正准备不日即可出发,除电商会及各法团查(?)照,俾免误会外,特先奉闻,即祈察照见复为幸。弟于学忠叩寝。”见《于学忠致王靖国电》(1930年9月26日),《阎档·各方往来电文》。

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6月20日议决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张氏谦辞未就,虽经蒋介石多次电催就任,仍一再婉拒。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仍未就任副总司令职,直到10月9日才宣誓就职。见《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591、634页。

《程汝怀致李宗仁电》(1930年10月23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谢(?)致田颂尧电》(1930年9月28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杨虎城致蒋中正电》(1930年10月10日),《蒋档·特交文卷·亲批文件》(13),台北“国史馆”藏,总编号875。

制定颁布是也。”基于“国民会议必须召开”、“约法必须制定颁布”，移至太原的扩大会议照常召开；10月18日，通过《国民会议筹备条例》10条，10月27日，完成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8章211条，后世称之为“太原约法”。

扩大会议通过《约法草案》并公诸报端，宣言以三个月为限，征求全国人民意见及批评。11月1日，《大公报》即针对该草案发表一篇社评，指出就“立法技术”与“实用”两方面而言，《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其缺憾和不足处；但就“理论”而言，则具备五项优点。其中有关“中央地方之权限”云：“中央用列举法，地方取概括主义，并依建国大纲，许省制省宪，足为集权分权之政争，消弭不少之祸源”；关于“国防军队用渐进方式”云：“由募兵制改为征兵制，驻防以国防地带为限，省除地方警备队外，不得自治军队、及自办军官学校、与军械制造厂，一扫国军私有之根蒂”。《大公报》的社评并于文末提到：“吾人认该项草案至少足备现在将来讲学立法时之一种参考。国府当局近年来迭表宽大之政见，对此昔为同志今为政敌者所提之法案，今后其有恢阔容纳之机会乎？多数受治之国民，盖不胜其企盼之情矣！”宪法学者陈茹玄，于评述扩大会议之《约法草案》时亦曾云：“虽以扩大会议之失败，而不克实现，然其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10月10—16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41期，总第2883页。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10月24—30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43期，总第2907页。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10月24—30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43期，总第2905—2906页。《中华民国约法草案》8章211条条文内容，可参阅邹鲁《回顾录》第2册，第382—409页。

《汪精卫等约法草案》，1930年11月1日《大公报》。

《汪精卫等约法草案》，1930年11月1日《大公报》。

《汪精卫等约法草案》，1930年11月1日《大公报》。

《草案》,固有足称述者”,如个人自由权利之规定、中央地方权力之范围及教育制度等。雷啸岑也认为:《太原约法草案》较合乎现代要求,即如1947年施行之《宪法》亦未必优于《太原约法草案》。足见无论是当时或后世学者,均给予扩大会议之《中华民国约法草案》颇高的评价。

扩大会议,因东北军入关由北平移至太原,又因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而告停会解散,但其召开国民会议和制订约法的主张确为南京蒋介石所赞同。1930年10月3日,蒋于前线兰封军次,即电请南京中央党部召集国民会议,他说:“亟当于讨逆军事结束之余,谋副全国人民之期望。中正以为目前第一要务,为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上述这段引言,正是扩大会议诸公已争得“千秋之名”的最佳脚注。

五、结 论

北平扩大会议,由酝酿、成立到结束,共经“争党统”、“争正统”、“争千秋”三个历程。阎锡山、汪精卫等欲成立扩大会议与南京中央争党统,却先导致改组派、西山派的党统纷争,粤、沪二届的纠葛难解,几乎使扩大会议胎死腹中,党务会议由北平谈到太原,又由太原谈回天津、北平,幸经晋阎代表赵丕廉、冀贡泉从中努力斡旋,才消弭双方歧见,扩大会议遂于7月13日正式召开,与南京

陈茹玄:《中国宪法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第185—187页。

《三十年动乱中国》,第171页。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10月3—9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40期,总第2867页。

中央党部互争党统。

此外,阎锡山等鉴于1929年护党救国军诸战役仍被视为地方政权对抗中央政权,难以号召;又为了结纳地方实力派、解决财政困难和争取国际支持,乃积极筹组国民政府。9月1日,北平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与南京中央政权互争正统。即自1928年北伐完成后,地方军人反抗南京中央的行动,仅局限于“争党统”;扩大会议另立国民政府,才开始有“争正统”之举。晋阎此一“争党统”、“争正统”的模式,后为1931年广州非常会议所袭用。

阎、汪等除了“争党统”、“争正统”外,为求国家长治久安,更致力于政治建设,以“争千秋”。而扩大会议通过的“求党真实意义实现”之7项基础条件,即为阎、汪等人的政治建设蓝图,其中召开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更为时代所需。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扩大会议移往太原继续未竟之志,汪精卫、邹鲁等人深知随着战局变化,反蒋联军已不可为,但仍致力于约法的制订;10月27日,终于完成《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汪、邹等人实已争得“千秋之名”。特别是扩大会议诸公召开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的主张,为南京蒋介石所赞许,翌年5月5日国民会议开幕,12日通过约法。是以,就中原大战的结果而言,阎、汪军事上虽告失败,但其政治主张却为南京所延续,斯可谓:“军事北伐,政治南伐”。

基于上述,扩大会议确为:另一个中央。

〔作者陈进金,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王立新】

we thought before.

Another Central Committee : The Enlarged Conference of 1930

..... *Chen Jinjin* (101)

The Enlarged Conference 's full name was " The Enlarged Conference of the Central Party Headquarter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 It was a conference jointly held by Yan Xishan , Feng Yuxiang , the Reorganization Clique (Wang Jingwei and Chen Gongbo , etc.) , and the Western Hills Clique (Zou Lu and Xie Chi , etc.) in Beijing in 1930 with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another Central Committee. Constrained by the Guomindang 's party orthodoxy , the Beijing Enlarged Conference has not been officially recogniz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Guomindang. Based on the first-hand data , such as the *Chiang Kai-shek Archives* and the *Yan Xishan Archives* , preserved in the Academia Historica in Taipei , the author tries to shake off the yoke of orthodoxy , face up to the political reality of China 's South and North division , and explain the Enlarged Conference in terms of three periods of " contending for party orthodoxy " , " contending for legitimacy " and " contending for posterity " .

John Dewey and China *Yuan Qing* (130)

On the ev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John Dewey , the American pragmatic philosopher and educator , was invited to China by members of China 's new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the following two years and two months , Dewey toured and lectured in many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and systematically propagated Pragmatism. Pragmatism caught on wildly , prevailing throughout intellectual and educational circles. At the same time , because his theories fitted in with the need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nd China '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reform , Dewey became the focus of the media and a favorite foreign thinker and educator in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China. Pushed forward by the Pragmatism movement , many scholars absorbed Pragmatism 's positivist spirit and developed Chinese modern positivist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meantime , Dewey 's educational theories also became the soul of the reform of the new educational system of China , through its influence on the key links in the reforms and on the standards and curriculum of the new educational system.

Ideals and Instrument : New Research on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Constitution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 1919 —1926

..... *Feng Xiaocai* (170)